
国统区

抗战文艺

运动大事记

文天行编

國朝文獻通考
卷之六

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

文 天 行 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责任编辑：陈文渊

封面设计：曹辉禄

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

编者：文天行

出版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印刷者：新都县印刷厂

发行者：四川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0.5

1985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字数240千

印数1—3,800册

书号：10316·20

定价：1.60元

目 录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	(1)
一九三七年·····	(29)
一九三八年·····	(49)
一九三九年·····	(106)
一九四〇年·····	(132)
一九四一年·····	(166)
一九四二年·····	(190)
一九四三年·····	(213)
一九四四年·····	(232)
一九四五年·····	(262)
一九四六年·····	(302)
后 记·····	(330)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文艺运动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延安及各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孤岛”、沦陷区等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都以饱满的爱国热情，投身于文艺阵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成效最为显著、影响最为深远者，还是延安地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茅盾说：“中国抗战文艺运动实开始于‘七七’以前，可是‘七七’以后这‘老根’派生了两支，一在大后方，一在边区和解放区。这两支所托的土壤不同，所呼吸的空气也不同，所受的风日雨露霜雪也不同；这就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发展也不同。更由于政治上的关系，这一本派生的两支，多少年来就连交换经验的机会也少得很。然而无论如何，它们总是同根生的。它们的立场是一致的。”（《抗战文艺运动概略》，载1946年10月《中学生》增刊《战争与和平》）解放后，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也说过：“我们有两支文艺队伍，一支在解放区，一支在国统区”，他还为这“两支文艺队伍胜利会师”而感到激动和高兴。（冯法祀《画家徐悲鸿赞抗敌演剧队》，载1978年《美术》第4期）解放以后，文艺史家对我国现代文艺运动作了认真的探讨并出版了若干专著，可是，对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对世界反法西斯文艺运动的中国组成部分，是研究得很不够的；而其中特别是对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不仅研究不够，还存在一些偏见，诸如斥之为右倾之类。这无疑是极左思潮的影响，不符合国统

区抗战文艺运动的实际。

—

研究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必须研究它的分期。抗日战争时期，整个文艺运动与政治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密切。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文艺运动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当然文艺运动有它自己发展的规律。研究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应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文艺运动的分期，不是现在才开始，还在抗战激烈进行中就开始了。郭沫若、茅盾、老舍、胡风、邵荃麟、司马文森等的文章及发言，都不同程度涉及到这个问题。当时思考得比较多的，似乎是孔罗荪。一九四二年，以叶知秋之名在《学习生活》上发表了《抗战文艺运动的五年》，着重谈了抗战文艺运动的分期问题。他说：“我们从这五年间的文艺运动纵的方面来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战争开始到武汉撤守，第二期是从二十七年冬天到二十九年冬天，第三期是从三十年到目前为止。”他还分别叙述了每一时期的特点：“第一期的现象是由于战争初期形势的狂热，表现于文艺运动上的，也就为这种蓬勃的狂热情绪所笼罩。”“第二期，由于战争形势逐渐入于相持阶段，文艺工作也渐入于沉潜而深入的阶段。”“第三期，由于长期战争中所带来的情绪上的滞着，反映于文艺运动上来的，则恰恰和第一期的狂热蓬勃有了一个相反的对比。但不是停滞和退步，乃是在更沉着的、深入的工作中，使抗战文艺运动有它更深一层的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虽说时间短——仅三年多，而形势变化也神速，但文艺家们仍在思考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分期问题。一九四六年九月，茅盾写了《抗战文艺运动概略》，对抗战文艺运动的分期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与孔罗荪一样，茅盾也是分的三个时期，但在具体的上下限方面，在对各时期文艺运动的认识上，有所不同。他认为：“第一个时期，应从抗战前两年（或者也可说是‘左联’自动解散那一年）起算，到武汉失守（抗战第二年）为止。”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抗战文艺运动“颂扬多于批判，热情多于理智，其有缺点，自毋庸讳言，曾有人给它以八字的考语：‘轰轰烈烈，空空洞洞。’而在‘空空洞洞’之外，尚有一严重的错误，即忽略了抗战两大目标之一——对内的民主要求。”其实，这一时期的文艺运动，在动员民众抗日救亡方面，有自己不可磨灭的功绩；而在抗战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上，也有自己肯定的地位。缺点乃至错误，不可避免是有的。茅盾认为：“武汉失守以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军事上是‘苟安’，政治上是逆转，经济上是饮鸩止渴。”“思想统治决不宽容前进的民主言论。”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在这样恶劣万分的环境中艰苦挣扎着。”但继承了“五四”新文艺传统精神的文艺家们仍坚守岗位，竭力使工作有意义。“他们介绍西欧古典名著，这仿佛是说，现在既然不是出击的时候，就研究兵法，练习把式罢。他们也把笔锋转向沦陷区（解放区是不许写的），这用意是借沦陷区的民气给大后方的人心一点刺激。他们也竭力想法反映大后方的现实，迂回曲折地描写了从抗战阵营中落伍而终于坠落的知识分子（如《雾重庆》剧本）。然而在当时文网之下，这已是可能反映的现实的最大限度！同时我们也得承

认，也有借西欧古典名著作遁逃藪的，也有为了避重就轻而写沦陷区的，更也有挂抗战之羊头，卖恋爱之狗肉而亦自以为反映了可能限度之现实的。”茅盾认为：“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直到日本投降，是抗战文艺运动的第三时期。”这一期，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险恶的阶段。”而在文艺上，那“冲破了那多年的窒息，放出了第一声号炮的是一九四一年秋剧本《屈原》的演出。这虽是一个历史剧，然而有百分之百的现实意义，是适当其时的‘爆炸’，是大后方抗战文艺运动在黑暗深沉中再进军的嘹亮的号角。”这时期的文艺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恶俗的风气，可以总名之曰市儇作风。”

一九四九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茅盾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这是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总结提纲，“实际参加起草者前后共七人，开会多次，交换意见的结果。”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分期，是这个报告提纲最先提到的重要问题。报告提纲对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分期与一九四六年茅盾的分期有很大不同，在对具体内容的认识上也有差异。茅盾在报告提纲中说：“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武汉陷落后一年半的时间（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三八年底），这算是第一个时期。”这正是抗战之初，“全国文艺工作者都非常兴奋，立即组织了许多演剧队、抗宣队，到农村和部队中去，写出了许多短篇和小型的作品”，尽管“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但没人能够抹煞它们在抗战初期所起的宣传作用。”他还谈到许多文艺工作者到战地和乡村去，不仅“扩大了视野，丰富了题材”，而且还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作品“不适合大众的需要，因而企求追寻新的东西。”“第二个时期是从武汉

陷落后，中间经过一九四一年初的皖南事变，直到抗战结束的前一年。”这一时期，顽固派“对反共反人民”“越来越采取积极的态度。进步的文艺运动所受到的迫害也就愈来愈严重。”尽管这时期有部分作家“表现了消沉的情绪”，但整个来看，“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仍旧继续保持与巩固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对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战斗，小说、诗歌、戏剧等等部门，都曾出现了暴露反动统治，鼓舞人民革命情绪的作品。”“第三时期是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法西斯深入进攻湘桂诸省到胜利的前夜。”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国民党反动派已公开和敌伪往来，经济的危机日益严重，对文艺界的压迫也日益加烈。”而这时期的文艺运动也“立刻参加到了这时候的民主运动中。”茅盾将“抗战结束以后，经过旧政协前后以至人民解放战争的这几年间”作为第四时期，划分这个时期的着眼点是“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而非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

建国以前对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分期问题的探讨，不管有否一致意见，对于深入研究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笔者在前辈研究分期的基础上，将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分成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九一八”事变起至“七七”事变止。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我国东北的进攻。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短短两

个月时间内，东北三千万同胞、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沦入了日本侵略者之手。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又向上海进攻。侵吞中国的狼子野心，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开始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之下，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建立起来了，与日寇进行坚韧不拔的战斗。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报告，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抗日的文艺运动，也随着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进攻而日盛起来。在这方面，东北作家群的贡献是卓越的。他们亲历日寇占领之苦，以饱蘸爱国热情之笔，投身于抗日救亡。茅盾说，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主题的作品，“在‘一·二八’以后就已经出世。这些作品的题材，主要是东北的义勇军和‘一·二八’淞沪战争。”还不仅如此，“‘左联’自动解散，正式号召文艺上的统一战线而提出‘国防文学’之类的口号以后，作为一种运动的抗战文艺确乎声势日盛而且推进了反日的群众运动”，不过，“卓越的作品并不见得比以前为多。”（《抗战文艺运动概略》，载1946年10月《中学生》增刊《战争与和平》）这一时期的抗战文艺运动，给“七七”事变以后迅猛开展起来的抗战文艺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个时期，从“七七”事变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芦沟桥事变以后，日寇疯狂进攻，河山不断丧失。人民群众火热的心里激荡着对敌人的恨和对祖国的爱。党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给人民群众以胜利的信心，使人民群众心里燃烧着的爱国主义火焰更加猛烈起来，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抗战文艺运动是整个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显示了自己的战斗活力。这时期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主要在上海、广州、武汉。比较而言，武汉的文艺运动比上海、广州成效更大，因上海和广州在“八一三”以后不久就成为了“孤岛”沦陷了。在这些地区，文艺界开展的活动是十分突出的：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救亡演剧队、宣传队，还建立了许多全国性的文艺组织，如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等。一九三八年四月成立的第三厅，虽不限于搞文艺活动，但在领导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方面，那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各种组织开展的活动，真是不胜枚举。比如，举办抗战扩大宣传周、纪念鲁迅与高尔基、举行抗日救亡公演、召开露天音乐会、举行漫画木刻展览等。“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有一个显明的缺点，那就是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有些隔膜。抗战开始以后，这种脱离群众的倾向有所改变。从客观上来讲，抗战不久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相继沦于敌手，原在那里的许多艺术家们被迫撤往中小城镇和村乡，无形中与人民群众就接近了一步。与人民群众接近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抗日热情和力量，只要发动起来了，中国有无限的希望。艺术家们考虑到群众多数没有文化或只有很少的文化，于是开展了文艺通俗化运动。抗战初期的报告文学、诗歌、戏剧、小说等，差不多都是以通俗化的形式出现的。从文艺理论来看，当时讨论得最多的是文艺与

宣传的问题，歌颂与暴露问题也提出来了。抗战初期，当局的文禁略有放松，大大小小的刊物不断涌现。《七月》、《烽火》、《抗战文艺》、《战地》、《文艺后防》、《文化岗位》、《战歌》、《抗到底》等等。这一时期的文艺运动，是搞得轰轰烈烈的，起到了抗日救亡的作用；对艺术家与群众结合，对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均打下了良好基础。问题也是存在的。这主要反映出一些文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严重，当然不是说没有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在当时那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形势之下产生这样的作品虽有可理解之处，但是，毕竟是不足。

第三个时期，从武汉失守到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形势日益复杂化起来。日本侵略者加紧进攻，顽固派积极反共。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们集中军队，向陕甘宁、晋西等地区的我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和晋东南的八路军进攻，同时还搜罗反动文人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重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老调。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顽固派并未因此而死心，一九四〇年十月，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一月达到顶点。我新四军北移部队九千余人，在皖南遭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伤亡重大，震惊中外。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文艺运动如何呢？与上一时期相比，显得沉潜而深入。上一时期的文艺运动，大都为动员抗日而发；这一时期，逐渐增加了争民主的分量。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据点又重新分布了。重庆、桂林、成都、昆明、贵阳、永安、西安等城市都聚集了一些文艺工作者，积极开展活动；重庆和桂林，尤其显得重要。第三厅在党的关怀、郭沫若的具体领导下做了

许多工作，遭到顽固派的嫉恨，一九四〇年秋将其“改组”了。接着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被任命为主任。文工会在领导抗战文艺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一时期各种全国性的文艺组织都纷纷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分会，特别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建立的分会更是星罗棋布。纪念中外著名文艺家，在这一时期是很突出的。鲁迅逝世纪念的年会照常举行之外，一九四〇年还举行了大规模的鲁迅诞生六十周年紀念会。高尔基逝世紀念会照例每年举行，此外还举行了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紀念会。争民主的因素或明或暗贯穿在这些紀念活动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以后，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在作家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了主动态度。虽提出后就在实践，但有组织、有影响的实践活动，还是武汉失守后开始的。一九三九年六月，以王礼锡为团长、宋之的为副团长的作家战地访问团组成了。这个团从重庆出发，经成都、西安、洛阳等地，达中条山和晋东南前线。他们深入军民之中，体验了生活，慰劳了将士，产生了硕果。此后，其他一些地区也效法起来。从文艺创作来看，作家们逐渐从抗战初期狂热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开始了冷静的思考和观察，努力跳出“抗战八股”的圈子，而一些人已着手长篇巨制的创作了。从文艺理论来看，这一时期着重讨论的是两个问题：民族形式，作家思想与创作方法的关系。民族形式的讨论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就开始了，争论得最多的是源泉问题，争论的总结，一般认为是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一九三九年苏联国内产生了现实主义的论争，抗战初期我国文艺界在如何对待光明与黑暗问题上本来就有分歧，两相结合，作家思想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的讨论就提到

了议事日程。可是这场讨论未能深入，因为皖南事变爆发了。为了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文艺批评的开展，这时期各种文艺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如戏剧座谈会、诗歌座谈会、小说座谈会、音乐座谈会、漫画座谈会、木刻座谈会等，成效颇大。

第四个时期。从皖南事变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皖南事变以后，顽固派为了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法西斯统治，一九四三年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是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鼓吹法西斯，诬蔑中国共产党，并叫嚣要消灭共产党和革命力量，两年内决定中国命运。他们在军事上包围陕甘宁边区，还企图闪击延安。由于党作了充分准备，坚决与顽固派斗争，迫使这次反共高潮停止了下來，但是，顽固派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们的白色恐怖。“在重庆，就到了一九四四年，民主运动还没有十分开展。那时候差不多的集会都是禁止的，即使有集会，要想当众畅所欲言，差不多有生命的危险。”（《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载《沫若文集》第13卷）民主的潮流毕竟是阻止不住的，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国统区争民主的运动日益开展并发展、壮大起来。文艺运动亦与此紧紧相联。开展各种纪念活动，是上一时期的文艺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这一时期文艺运动的重要特色。不同之点在于：这一时期纪念活动范围扩大了许多。鲁迅、高尔基等逝世年祭仍在进行不用说了，还增加了对其他世界著名艺术家的纪念，比如一九四五年，重庆就举行了两次罗曼·罗兰悼念活动。而纪念诗人节、艺术节，也是这时期开始的。为生者开的诞辰纪念会，已成为这时期纪念活动的一大特色。比如，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

十五周年、庆祝老舍创作二十周年、庆祝茅盾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等。宣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这时期国统区文艺运动的重要内容。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了座谈会，围绕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阐述，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六月，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就有了反响，并积极宣传起来，对国统区文艺健康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顽固派因《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和影响而恐惧、而仇视，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他们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文艺政策，竭力往自己脸上贴金，企图抵消《讲话》在国统区的作用。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开展了一场规模盛大的批判顽固派文艺政策的斗争。茅盾说：我们“曾经对于当时大吹大擂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文艺政策’从各种角度上加以抨击，使之体无完肤。”（《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在国民党文艺政策的鼓噪之下，战国策派卖力地鼓吹所谓“民族文学运动”。进步文艺界从各个方面向这些国民党文人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从文艺创作来看，这一时期的历史剧创作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达到了高峰，密切配合了抗日民主运动。这是从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开始的。继《屈原》之后，郭沫若又连续创作了《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许多剧作家也面向历史。田汉、阳翰笙等的历史剧，各具特色，颇有影响。这一时期诗歌和小说的创作，无论是在揭示生活，还是在艺术技巧方面都比前一个时期高一筹。从文艺思想上看，这一时期主要强调的是人民本位，也就是要深入群众、反映群众、歌颂群众。这与《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分不开，《讲

话》主要谈的就是文艺与人民的问题。在现实主义问题上，一些理论家比较强调主观的作用，强调发挥主观战斗精神。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文艺家“局限在后方的小天地之中，被阻塞了和人民大众接触的路子，出版事业濒于窒息，文艺不当作整个抗日战争的一环而被视为‘娱乐’的手段，于是而风花雪月的风气抬头，消闲猎奇，谈狐说鬼的‘文艺’继起，文艺变成了少数人茶余酒后的消遣。”（1944年4月16日《新华日报》社论《祝“文协”成立六周年》）

第五个时期，从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战争爆发。抗战胜利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运动并没有嘎然而止。随着民族矛盾下降，阶级矛盾又上升了。顽固派抢夺胜利果实，收刮民脂民膏，钳制社会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掀起了大规模的争民主运动。而文艺运动正是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复原、废出书报检查，都是其具体内容。抗战胜利后，还有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是清查附逆文化人。这些汉奸文人是民族的败类。

三

“九一八”事变后，党就注意了联合抗日的问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了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党即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由于党的不懈的努力，由于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